

卷一
历史寻踪

1

我的家庭历史^①

我的老家在安徽芜湖青弋江畔。童年的记忆早已变得模糊，只记得对岸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每到春季油菜花开，触眼是灿烂的金黄，与岸边绿色的垂柳相映成趣。

但家里的人们从来都把自己的籍贯填报为浙江吴兴（今湖州市），至今连我们兄弟的下一代亦复如此。我从小流浪在外，对家族历史了解甚少。幸好大哥作为长房长孙，还保存着一本《吴兴荻溪章氏家乘补编》（1944 年版），才使我粗略地获知自己的家世渊源。

荻溪亦称荻港，因水中芦苇丛生、无边无际而得名。聚族而居的章氏最初似乎没有什么显赫的祖先。一世祖、二世祖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二世祖的牌位上“题曰处士”，可能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三世到五世均系一脉单传，直至六世才算有了兄弟三人。自此人丁逐渐繁衍，从九世开始分成若干祠堂，我家属于清芬堂。荻港地少人多，出外谋生者渐众，尤以经商、游幕者为多，我家先人大概就是游于业幕而侨居外省。

^① 1995 年年初，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以“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名义邀我前往讲学。为满足许多友人的要求，我在一次全院师生参加的周会上，作了题为“历史寻踪”的讲演，概略地介绍了我的家世和学术生涯。由于许多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据该院李院长说大概只有 30% 的人真正了解演讲的内容。所以，我感到有必要自己动手把讲话稿整理成为文章。今分篇收入本卷中。

据文献和实物可考者，从我们的十二世祖实庵公开始才进入仕途，成为官僚世家。实庵公在晋、陕两省做过知府或道台之类官员，家中曾长期保存着林则徐书赠给他的条幅和对联，可惜焚毁于“文革”中“扫四旧”之际。十三世祖怡棠公亦曾任地方官员并一度入左宗棠幕府，以前老家曾存有他手书的诗词结集，但早已无可查寻。大约正是由于怡棠公的渊源，十四世祖干臣公（我的曾祖）少年从戎。于光绪二年（1876）以监生报捐州同身分投效左宗棠西征大营，转战于新疆南北两路。1880 年以军功补知州，并在左营经办哈密屯防。西征结束后，历任安徽抚署文案、牙厘局提调、无为州知州、怀宁县（安徽首县）知县等职。

干臣公是我们家人心目中的英雄。其实他的仕途并非得意，后来在宣城任内，因上级对当地“教案”肇事民众处分过重，愤而辞职。甲午战后转而投身实业，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下海”。1896 年在芜湖创办益新面粉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工厂，正式开工比南通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还早两年。嗣后他又在安徽当涂以新法开采凹山铁矿，并在上海设立宝兴铁矿公司。宝兴铁矿有自己的铁路和码头，矿石主要是外销日本八幡制铁所，堪称是今日马钢的前身。干臣公进取心很强，晚年还会与开滦公司协议合办开平煤矿（我的大哥即以开平为名），不幸在 1920 年初因病早逝。此后家人不善经营，加以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政府的巧取豪夺，两家公司先后被政府“劫收”或宣告破产。

及至我出生之日，家道已逐渐中落，我并未看到先辈当年的辉煌。我之所以追忆往事，无非是因为这种家世对我的学术生涯有两点影响。一是由于干臣公的事迹，诱发我研究张謇的兴味，也有助于我对张謇的理解；二是由于这样绅商门第的背景，有利于我与自己某些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使我得以结识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后裔。记得 1963 年秋天，我们学校的老院长杨东莼先生，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把我借调进京，协

助征集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并指派我经常与章士钊（行严）先生联络。他在带我去史家胡同章府初次拜会之前，曾悄悄问我：“你与行老有无宗亲关系。”我说：“没有。他是湖南人，我是浙江人。不过我的堂伯章宗祥倒是与他有北洋同寅之雅。”东老非常高兴，连忙嘱咐我说：“很好，老辈人特别重视世谊，这样便于你和行老深入交谈。当然，章宗祥名声不好，但你不必有所顾虑，万一引起什么麻烦，由我负责。”那时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声调响彻云霄的年代，所以东老才作如此似乎是多余的解释。果然，行老见到我倍加亲切，待我以世交子弟情谊。事后他曾对夫人吴弱男说：“我见到仲和（章宗祥的字）后人，人品，学问都好。”其实我属清芬堂一支，章宗祥属振麟堂一支，并非很近血缘关系。但总算因为这点宗族渊源，行老对我撰写张謇传稿颇为关心，在我一部分张氏未刊信札笺注上作了认真的批注和订正。至于其他历史人物或其后裔为我提供的资料等多方面帮助，这里就不必一一缕述了。

2

我的学术生涯

我有幸成为一个历史学者，或多或少出于偶然。

中学时代，酷爱文学，勤练写作，由于牢骚太甚，语多冷峭，同学间有以“小鲁迅”相称者。我虽不敢有此非分之想，但确实很想将来成为一个文学家。

大学时代，虽然在历史系读书，但并未树立此项专业思想。除听课与应付作业、考试以外，爱读文学作品与其他社会科学书籍，

并未认真攻读史学经典。记得我们历史系有一个小小的读书会，曾不定期出一个名叫“天南星”的墙报，属于进步学运阵营。我常为这个墙报撰稿，也曾在夜深人静与三五同学悄悄把墙报贴出去。我写的稿件稍有影响者有两篇：一篇是政治讽刺诗，题为《火车抛锚》。此诗摹仿马凡陀(袁水拍)通俗风格，而采用的却是印第安古老歌谣《大白翅》(Big White Wing)的格律，由于内容和形式都比较清新而流传到校外。据说曾有音乐系学生打算为之谱曲，但不知到底谱成没有。另一篇是政治评论，题为《漫话金圆券》。起因是读书会曾为金圆券的发行举办一次小型座谈会，大家认为我的发言比较中肯，便推我执笔撰写此文。记得当时领导读书会的曾宪洛同学，还为我代拟一个“文封湘”(暗寓章开沅)的笔名。墙报贴出后居然招引很多人前来观看，因为金圆券的发行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和国民党政府的前途，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费用。据说连经济系有的师生也很重视这篇文章，到处打听“文封湘”是什么人，为什么能够运用西方货币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剖析刚刚出笼的金圆券的运作及其前景，而且说理还比较切中要害。其实连历史系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在进入金大以前，曾经读过不到一年的会计大专，多少有点中外经济学、经济史和货币学之类的底子。现在看来，这些文章当然都很稚嫩粗疏，但说明我很早就有钻研社会科学兴趣，不过却从来未曾想过要研究历史。当时我的志愿是当一名记者，特别是战地记者，那才是充满挑战的够刺激的职业。

1948年冬天，如同千千万万进步学生一样，我辍学进入中原解放区。革命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本想当个跨马佩枪、文武双全的战地记者，却不料被中原大学校方看好我这个三心二意的“理论人才”；被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从此与历史建立不解之缘。以后中原大学随军南下，我又隶属于该校新创办的教育学院历史系。1951年秋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两

年以后正式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我便在这个学校的历史系教了一辈子中国近现代史。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者，确实是心口如一地献身革命。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当然革命也不容许个人有自己独立的人生选择。

因此，我常说，是革命为我选择了职业，而职业使我从家族的历史走向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我又常自我解嘲：我的职业像包办婚姻，通常应该是先恋爱后结婚，我却是先结婚后恋爱。我是在担任历史教师以后，才逐渐增长了对于史学研究的兴趣。

1954 年以前主要是应付教学，试想，一个只读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要独立地为大学本科生，甚至为在职中学历史教师（有些人相当于我父亲的年龄）开课，而且经常是每周 3 门课、13 个课时，那是多么勉为其难。不过，也许是由于我的运气太好，教学从一开始就得到较佳反映，无论是本科生还是比我年长的中学教师，大多乐意听我讲课。这样才逐渐增强继续教学的信心，并挤出一点时间进行若干结合教学需要的课题研究。

初期的研究往往是赶潮流，侧重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太平天国史。1960 年以后转入辛亥革命研究，特别是张謇研究，1960 年以前，我发表论文较少，与外地同行学者的联络更少，可以说是僻处乡野，孤陋寡闻。1961 年辛亥革命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使我得以聆听一些著名历史学者的教诲，也使我结识外地一批才思敏捷、学有所成的青年隽秀。1963 年，承蒙杨东莼先生的关切与提携，经学校同意把我借调到北京，名义上是协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实际上是享受带有进修性质的学术休假。在北京一年多期间，主要是研究张謇，利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近代史料信札》和原来在南通搜集的《张謇未刊函札》等相关原始资料，对照《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等已出版书籍，做系统的史料长编与笺注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写成 20 多万字的书稿，这就是迟至 1986 年才经中华书局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

稿》一书的原坯。北京之旅使我大开眼界，不仅得以利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丰富藏书，而且得以向许多全国知名的师友经常问难切磋，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一个新的起点。

但是，北京作为首都，又是一个政治极为敏感和人际关系相当复杂的地区，而我对此毫无察觉。1964年秋天，名为学术讨论而实为政治批判的意识形态讨伐渐形紧锣密鼓，一向谨小慎微的杨东老唯恐我们年少气盛，有可能以文字惹祸，曾多次说及这些学术讨论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并以自己的老友孙冶方等知名学者受批判为活生生的例证。对于这些好心的劝喻我却漫不经心，仿佛与自己毫无关系，只知道埋头从事张謇研究。不料有天《光明日报》记者突然前来约稿，希望我对戚本禹评论李秀成的文章发表一些意见。我与《光明日报》关系比较密切，而且这位记者与我谈得又很投机，所以便连夜赶出一篇题为《不要任意美化，也不要一笔抹杀》的文章寄给该报。没过几天《光明日报》就刊登了这篇急就之作，但却在上半版同时刊登了署名任光（即吴传后）的批判文章，直指我是反马克思主义，以折衷主义手法为叛徒辩护。不久，中宣部即通知湖北省委，内定我为重点批判对象，回鄂接受批判，同时通知各地报刊不得发表我的文章。既动员参加学术讨论，又不容许为自己声辩，我这才体会到‘学术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的厉害，也才体会到东老谆谆告诫的苦口婆心，但一切都为时晚矣！

这种挨批的角色一直延续到1966年，而由于有此前科，我在“文革”中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学术研究随之长期停顿，蹉跎岁月达10年以上。

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前不久，人民出版社林言椒编辑不甘于寂寞，悄悄鼓励我组织两湖与川、黔部分学者编写《辛亥革命史》大型专著，这才又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重操旧业。幸好“文革”不久就收场了，《辛亥革命史》编写组的同仁情绪很高，日以继夜地

全力投入编写，而且其他各地相关学者也给予许多关切与帮助，这部 120 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终于在 1981 年 10 月以前全部出齐，成为对辛亥革命 70 周年的一份厚重献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且提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新学风。学术界和其他各行业一样，人们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像埋藏在地下的泉水一样突然喷涌而出。这也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继合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许多论文。从 1979 年秋天开始，我又多次应邀前往美、欧、澳、亚许多国家及地区开会、讲学和访问，1990~1993 年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加州三所大学任教和研究达三年以上，在促进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特别是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外学术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

80 年代以来，我在辛亥革命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非常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研究，也比较注意区域研究（如江浙）与个案研究（如张謇）。有些中外学者以为我可能是接受了美国同行学者的影响才有此变化。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重视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基础）的研究，而且我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以社会运动为整体对象，并没有局限于个别的人物与事件。至于说把社会学方法引入辛亥革命史研究，则要感谢我在金大的已故老师马长寿教授。他作为历史学家来讲授社会学课程，自然使我这个历史系学生得到更多的启发，所以对于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概念和方法我早已略有所知。我还要感谢另一位已故老师王绳祖教授，是他在动荡不安的南京为我们开设汤因比史学介绍讲座，使我们对这位大学者的思想体系兴味渐浓。所以，当 80

年代国内介绍西方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渐形热潮时，我并不感到十分陌生，而且多少知道有所鉴别。当然，我并非完全否认当代海外知名学者对我的影响，他们对我在信息和资料方面的无私帮助，特别是他们出色的研究成果对我的多方面启发，都使我受益匪浅。

不过，我在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时，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比较注意分析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作为个人与阶级的中介——群体之上。这两个特点，实际上都是从 60 年代初研究张謇时即已开始呈现，只不过由于长期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难以充分挥洒而已。80 年代中期以后，为了拓展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历史研究所的工作领域，我与一批年轻学者先后开始投入中国现代化研究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过去我所损失的时间已经太多，剩下的时间又未免太少。现在，我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类，别无更为宏大的抱负与规划。但我内心却抱持着一个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不断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3

我的人生追求

尽管年轻时有种种浪漫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抱负，但却命中注定只能当一辈子教师。不过，我欢喜教师这个职业，我欢喜学生，学生也欢喜我，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古语云，人生得一知己，死

而无憾。我有那么多理解、信任、欢喜我的学生，遍及国内和海外，对于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来说，已经足以自慰了。

我对于以豪言壮语装点起来的伟大空话历来非常讨厌，更不满于有些人常常想把史学变成政治的婢女。我与楚图南先生素不相识，也从未参观过戴震纪念馆，但却非常欣赏楚老先生为该馆题诗中的两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80年代以来，我经常以此自勉并勉励自己的学生。我认为，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无论在政治压力还是金钱诱惑之下，都不能忘记这个根本。优秀的史学是文化瑰宝，应该属于全人类，而且可以流传于千秋万载，这就是有些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永恒。尽管史学在社会上受到冷落，甚至还不免受到某些无知的干扰，但历史学者不应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自己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决不止一个，而是一批乃至一大批。勇敢地迎接权势与金钱的挑战吧，史学和史学家们！

我一向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把他们视为希望之所在。但我从来不敢以人梯自喻，因为我缺乏应有的学术高度，一部分是由于丧失的时间太多和思维的空间有限，一部分是由于自己的少年失学与勤奋不足。时下流行的“人梯”之说已失原意，常见平庸之辈也高唱“甘当人梯”，使人未免啼笑皆非。人梯之说大概是由牛顿的名言引申而来，然而牛顿的原话是：“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试问，如果是站在侏儒的肩膀上，难道也能看得比别人更远吗？人云亦云，不求甚解，随波逐流，大抵如此。当然，我并非贬抑一般长者扶掖青年的热情，因为“甘当人梯”毕竟比“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高尚得多，至少是有益无害。我在这里只不过是更高的学术标准出发，同时也结合自己的切

身体会,说明‘人梯’自有严格含义,并非人人可当,正如‘大师’、‘人师’的称号也非人人都可以领受一样。至于我个人的志愿,无非是甘当铺路石子,让青年学者成长的道路稍为平坦一点,可以比我们前进得更快更远。有一个深夜我忽发奇想,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1979年在东京大学搜集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的档案文献,1980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状况,都为本所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成长起了若干导引作用。而经过他们不懈的协同努力,便出现了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的开辟。这正是我感到聊以自慰之处。

真正的学术应是全人类的公器,真正的史学其价值必然超越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为了史学的国际化,包括把外国优秀史学介绍进来,把本国优秀史学介绍出去,国际学术交流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从1979年开始,我有幸在这方面参与了大量工作,不仅加强了中外史学的交流,而且增加了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之间的了解与友谊。至今,我们历史研究所与日本、美国有些著名研究所的交流与友谊已经延续到第三代人了,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有些学术重镇的交流与友谊也正在向中、新生代延伸。同时,在旅居海外期间,我又与外国留学或任教的众多中国年轻学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他们的学业成长与回报祖国多少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我离开耶鲁大学时,该校两岸学会的王宏欣同学即席赠诗:“桃李满天下,文章鬼神惊。讲学广会友,寻道每怀情。侃侃谈国事,谆谆励后生。男儿轻聚散,唯愿海河轻。”诗中虽有溢美之语,但其恳挚之情确实使我深受感动。⁴⁰多年来,无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国内国外,我为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的成长,耗费了不少精力与时间,对自己的著述

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我永远无怨无悔，因为学术的小我只有汇入学术的大我才能进入永恒。

总而言之，为造就青年学者开路，为发展学术交流搭桥，这就是我的人生追求。

卷二 师友杂忆

4

中 小 学 老 师

师恩难忘。中小学时代的师恩更加难忘。这是由于儿童和少年可塑性很强，中小学教师比大学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更大。

我开始进的小学，在武昌胭脂路，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并非如校名那么美好。抗战前，武汉的小学老师都执有教鞭，在课堂上除用以指点地图、板书外，还具有敲讲台乃至‘接触’学生肢体的威慑功能。有位姓凤的中年女教师，语文课教得很好，但从来不苟言笑，极为严厉。我由于大字往往写出格线且溅有墨汁，时常有幸蒙受教鞭的关爱。凤老师出手颇重，特别是冬天酷寒，我们上课前都要在课桌边角上把手心摩擦得红通通的，否则冷手挨重鞭其痛更加难熬。但我从不怨恨凤老师，她确实希望我们有所长进，而每次上课眼眶都有两个大黑圈，操劳已使她过早苍老。

1933 年回到芜湖，随着哥哥、姐姐进入襄垣小学。记得抗战胜利后我曾旧地重游，看见 1937 年我们毕业时捐献给母校的纪念亭依然保存完好，碑石上还刻有我们全年级的同学姓名。这所小学当时小有名气，特别是文艺活动出色。可能由于校长张学诗是艺专毕业，教导主任程先生则是音乐教师。程主任曾把京剧《蒋干盗书》等折子戏改编成现代歌剧，演员、伴奏完全由学生担任，演周瑜、蒋干的两位主角都是我们同班同学，公演后在当地引起很大轰动。这样浓郁的艺术氛围，对儿童性灵的陶冶很有好处。

但对我影响更大的却是张校长。我才进入该校一年，他就因